在理清史实基础上评价程朱理学

江西省樟树市滨江中学 朱仁乐

在对程朱理学进行评价时，我们一般借助图片与文字等史料，引导学生辨证评价，最后得出结论，如消极影响（维护专制统治，扼杀人性，空谈误国）、积极影响（社会教化，塑造中华民族品格等）。这样看似评价，但往往用结论型史料去证明论点，不符合史料实证的宗旨，学习处于低层次水平，学生只记得结论，无法理解背后思想肌理。

要真正做到评价程朱理学，笔者窃以为需要深入理解概念内涵（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要做到这一点，黄牧航先生建议“第一层是了解历史概念所反映的基本现象（时间地点人物等），第二层是了解历史概念所包括的丰富史料素材，教师丰富学生对具体史实的感性认识。第三层是总结提炼历史概念的内涵”[[1]](#footnote-0)。因此，了解史实很重要。通过呈现丰富的史实，引导学生在情境中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更好掌握概念本质属性。史实学习在概念评价过程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一旦了解到的史实越多，评价自然而然就会得出”[[2]](#footnote-1)

虽然笔者课堂上讲授了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主张（理、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等），但往往是简单提及代表人物或借助晦涩的古文材料来说明思想主张，抑或直接把程朱理学内涵讲授出来，学生对其他史实几乎很少了解，缺乏思考。如此，自然很难深入理解以及评价概念。因此要理清与辨析相关事实，不然评价犹如“禅外说禅”，空中楼阁一样。

许多学生误认为程朱理学是两宋的主流思想，这种认知会制约概念的理解，教学中要打破固有认知。为此，笔者窃建议从了解程朱理学在两宋所处的地位及其背后的原因等史实着手，进而认识到程朱理学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其深度评价，加深学习印象，提高思维层次。

1、程朱理学不是两宋的主流思想，长期处于边缘、被官方打压的地位。

北宋初期，统治者实行三教并行政策，既尊崇儒学，也利用与扶持佛道二教。一般士人墨守汉唐经学，思想保守。这种状况直到宋仁宗时期发生变化。宋朝内忧外患，面临统治危机，一批士大夫要求改革，纷纷否定汉唐经学，排斥佛道异端，要求复兴儒学[[3]](#footnote-2)。不过这一时期并没有建立起理学。理学真正崛起与形成，大概要等到11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4]](#footnote-3)。贡献要归功于程颐、程颢兄弟。因此，理学形成时间很晚。

理学形成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受到官方重视。教学中可以提供两位理学家（程颐与朱熹）人生经历来说明这一点，如下表：

|  |  |
| --- | --- |
| 程颐 | 朱熹 |
| 1033年，出生；  1085年，经司马光推荐，被授洛阳国子监教授等职；  1088年后，基本脱离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  1086年，任崇政殿说书；  1096年，在新、旧两党斗争中，因新党再度执政，遭贬；  1100年，短暂恢复官位；  1102年，恢复新法的宋徽宗下令追毁他的全部著作，夺去官位。  1107年，病逝，洛阳的朋友和门生不敢送葬。  1220年，宋理宗赐谥为“正公”； 1241年，追封为“伊川伯”；  1330年，封为“洛国公”。 | 1130年，出生；  1188年，向朝廷上奏，提出一系列建议。但触及当政权臣利益，被弹劾为“假道学”，无法参政；  1194年，被举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指斥宰相[韩侂胄](http://ren.bytravel.cn/history/1/hantuozhou428.html)窃权害政，被罢官；  1194年，于行宫便殿奏事。后奉诏讲《大学》，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滥用，引起宋宁宗和韩侂胄不满，被罢官；  1196年，反对派奏劾朱熹“十大罪状”，理学被污蔑为“伪学”，朱子门人遭迫害；三月，朱熹去世。  1210年，宋理宗赐谥号为“文”；  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 |

从表中能看出，他们生前政治经历曲折，遭受过政敌打击，未得到统治者重用。两宋时期，程朱理学长时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被打压地位，没有进入到权力中心。虽然理学家死后受到南宋朝廷的追封、祭祀，程朱理学看似受到官方推崇，但不能说官方独尊。因为受到重视的还有其他思想，如陆学、浙学、婺学、湘学等。邓广铭先生说：不但因二程等人的学说流行较晚，在北宋一代的学术界不曾取得支配地位；即在南宋一代，尽管有理学大师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出现，然而理学家们的声势仍然未能笼盖当时的学术界[[5]](#footnote-4)。程朱理学真正成为一种受到官方与民间广泛重视的思想，是在明朝以后。

2、程朱理学为什么在两宋没有成为主流思想，长期被打压？

两宋历史上长期受统治者支持的思想是一种功利主义观念，也就是“政术”。先秦以来，国家应采用道学来建立王道社会，还是借助“政术”实现霸道社会，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术”往往侧重方法、策略，具有功利性、适用性、现实性，追求利益、欲望、霸政，忽视儒家道德要求，能快速解决具体的问题，也能短时期实现国家暂时强大。它采取激烈的实用政治策略，主张言利言欲,为霸政辩护[[6]](#footnote-5)。王安石就是这一思想代表人物。因为解决实际问题立杆见影与速见成效，所以掌握政治权力，占据主流思想地位。

前文提到，理学家追求的是“道”（“术”的升华）。他们批评“术”只是细枝末节，表面上的学问，不符合“道”，鄙视“术”的现实性、功利性。他们追求的不是暂时的强大，而是永恒的万世太平。理学家一生研究心性理气等根本问题，用极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与衡量一切，并且通过实践去追求“道”。他们还经常用“道”来制约皇权。如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但程颐指责新法过于重视“利”而忽视“义”。当新法实施时候,程颢“每进见，必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一言及功利”[[7]](#footnote-6)。朱熹也曾向向宋孝宗上《戊申封事》，用理学分析现实，指出孝宗“心不正”导致国势积弱与统治危机，劝谏皇帝为人处事，关键要“正心”，符合天理，克制人欲，才能富国强兵[[8]](#footnote-7)。统治者不仅要有“治术”,而且要有“治德”。因此，理学是一种超出世俗、理想性的“道”，是富有理想主义的士大夫对抗政治权力的武器。从这方面来说，统治者自然不会支持理学。

另外，程朱理学将道德伦理置于至高无上地位，只谈心性、道德，不重视军务、赋役等具体事务。如朱熹总把“正君心”作为头等重要事，而把如何御侮、 安民、理财、 练兵等事一律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9]](#footnote-8)。这样就给人一种不切实际，只谈道德的空谈。宋神宗批评理学家 “所谓道德者,非道德也”，总是怀疑程颢等人“迂阔”, 王安石批评程颢学说是难以实行的空谈[[10]](#footnote-9)。两宋长期面临着一系列内外危机（民族危机、统治危机、社会危机），因此适用性的“术”更符合统治者青睐，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更有帮助。

3、评价程朱理学

结合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程朱理学是一种超出世俗、普遍性、理想性的“道”，是在阐释儒家义理的基础上，不断穷尽天下之理，追求儒家道德伦理，并以极高的道德标准严格要求一切，带有道德空谈，是修身正心，制约世俗皇权，规范社会秩序，拯救天下苍生，最终实现万世太平的根本。了解程朱理学内涵后，再来评价就很好理解。

首先，程朱理学本身具有道德空谈性质。一旦成为读书人考试的内容，一般人对理学造诣不深，容易把理学当作追求名利的世俗工具，学问脱离现实，只谈伦理道德，忽视具体事务，造成空谈误国。其次，理学追求极高的道德修养，用儒家道德伦理衡量一切。这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教化，对形成中华民族品格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极高的道德品质，特别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如果将这一套标准作为统治的方式，程朱理学就很容易沦为扼杀人性、压迫人欲的工具。

最后，对于程朱理学的评价，笔者以为葛兆光先生的一段话很有见地。“当一种本来是作为士绅阶层以文化权力对抗政治权力，以超越思想抵抗世俗取向的，富于创造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学说，当它进入官方的意识形态，又成为士人考试的内容后，它将被后来充满了各种世俗欲念的读书人复制，它的本质也在被逐渐扭曲”[[11]](#footnote-10)。程朱理学由“道”演变成“术”，本质发生质变，这或许是朱熹等理学家未曾料到的，但正是这种转变，理学才有可能影响巨大，受到广泛重视。所以，程朱理学本质的扭曲，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1. 黄牧航：《中学历史概念教学的实践反思》，《历史教学》（上半月）2023年第9期。 [↑](#footnote-ref-0)
2. 何成刚、沈为慧、张克州：《历史解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以“原子弹轰炸事件”为例》，《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3期。 [↑](#footnote-ref-1)
3. 包伟民：《宋朝简史》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261页。 [↑](#footnote-ref-2)
4. 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footnote-ref-3)
5. 宋东侠：《理学对宋代社会及妇女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footnote-ref-4)
6. 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footnote-ref-5)
7. 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footnote-ref-6)
8. 祝总斌：《略论朱熹《戊申封事》的特色和宋孝宗的度量》，《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2期。 [↑](#footnote-ref-7)
9. 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料学版)1991年第2期。 [↑](#footnote-ref-8)
10. 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footnote-ref-9)
1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页。 [↑](#footnote-ref-10)